

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金坚范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2008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张克辉先生来了。据全国台联副会长史茂林先生在会上介绍，他去向张克辉先生报告工作，问他是是否出席。张克辉先生却当即表示“当然要去了，老朋友了”！张克辉先生不但来了，而且还讲了话。

张克辉先生在地方和中央为官数十年，但他的讲话并无当今官场泛滥成灾的八股气和放之四海皆准的平庸套话，而是用闽南普通话娓娓道来，如叙家常一般明白晓畅，十分朴素却亲切感人。

他首先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前后，读到陈映真先生在台湾乡土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开始心仪这位远在海峡那边的爱国主义作家。俩人初次见面是1990年3月，陈映真先生以台湾统一联盟主席身份率领该盟代表团访问北京。陈映真先生在北京台湾民主同盟中央礼堂，含着眼泪向包括张克辉先生在内的“有家回不得的老台湾候”时，“他的话使我们感动流泪”，他还特别感谢陈映真在台湾出版了他的两本散文、杂文、诗集。张克辉先生用日文写作自译为中文的诗，陈映真亲自修改；两本书的校对陈映真则请丽娜夫人负责。对陈映真先生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立场，张克辉先生予以高度赞扬：“在台湾走这条爱国道路是不容易的，有人半途而退了，有人彻底变了。但是陈映真先生毫不动摇，一直坚强地走到今天。他很早就提出要反对文化‘台独’。”

那天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中，张克辉先生是官阶最高的，属国家领导人序列。所以安排为最后一个发言，发言后是合影、茶歇。

克辉先生不但出席如仪，完成了组织者的使命，而且还发表了一篇出自肺腑的讲话，可谓超额完成了任务，且又年过八旬，完全可以在众人尊敬的目光中告辞了。但他没有走，依然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全国台联在就近的娃哈哈大酒店宴请，张克辉先生此时更可以抽身了，还是没有走，与大家共进午餐，坚持到最后。张克辉先生对病患康复之中的陈映真先生，不忘旧情，且发表讲话还自始至终坚持听会，令我想起了台湾著名作家李昂对他的评价：“他内敛的性格里有情有义。”我便萌发把这一感人情景记录下来告诉大众的念头。因有些人出于不同原因早已退席，午餐时我的座次便连升三级，被安排坐在他的左侧，就利用这一便利提出希望给我一份讲稿的要求。话音刚落，张克辉先生便伸手从西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了折叠好的讲稿给我。我展开看时，大为惊喜，因为稿子并非秘书捉刀代笔后的打印稿，而是克辉先生亲自手书的。

克辉先生曾对我个人的工作予以积极的支持，也是让我永远难忘的。与克辉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台联宴请一些应中国作协邀请来访的台湾作家代表团，我在这样的场合见过他二三次，那时仅是握手寒暄而已，并无深入接触。初步的印象是他不尚华靡，恬淡自然，谦和笃实。第一次深入交谈是2003年初。我当时在筹备“杨逵作品研讨会”，得知张克辉先生在台湾时曾与杨逵先生有过交往，便去请他。对台湾文学的全力驱驰先生，克辉先生十分敬重，不但慨然应允要出席，而且还要写文章纪念杨逵先生。后来会议延期至2004年才召开，克辉先生当时还在任上，因有公务，未能前来，但托人送来了他的纪念文章。克辉先生回忆了在1948年，作为一个文学小青年在台湾参加一次文学界联谊会时，杨逵先生对他这位晚辈的关照、呵护。他说，杨逵先生“在会上强调‘为人要诚实，写作要立足于现实’的教导，对我影响很大”。

那次见面，我还借机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其中，我谈到一个观点：大陆研究台湾文化的学者中，有些人对“文化‘台独’”认识不够。对此，他立即修正、补充。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在研究台湾文化的大陆学者中存在，就是搞对台政治工作的人中也存在。克辉先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此坦陈已见、激浊扬清，而且是批评搞对台政治工作的人，难能可贵！

此次开会之前，在休息室见到他时，我又提起那次见面和谈话。他点头默认我的回忆，并补充说，早在199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要“重视”“文化‘台独’”问题，可在发表时这句话没有了。事后他追问了一下，编辑部回答说电脑出了错。说到此，他举起右手，用手指了指脑袋，说“这儿出了问题”。

克辉先生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且已年过八旬，照理应该含怡弄孙、坐享天伦之乐了，却奇情笔端，依然不停笔地写作。继前几年推出的电影文学剧本《台湾往事》《云水谣》之后，最近又出版了电影文学剧本《眉洲岛奇缘》及《啊，谢雪红》。这说明他退而不休、用不停的思考来保持良知，参与社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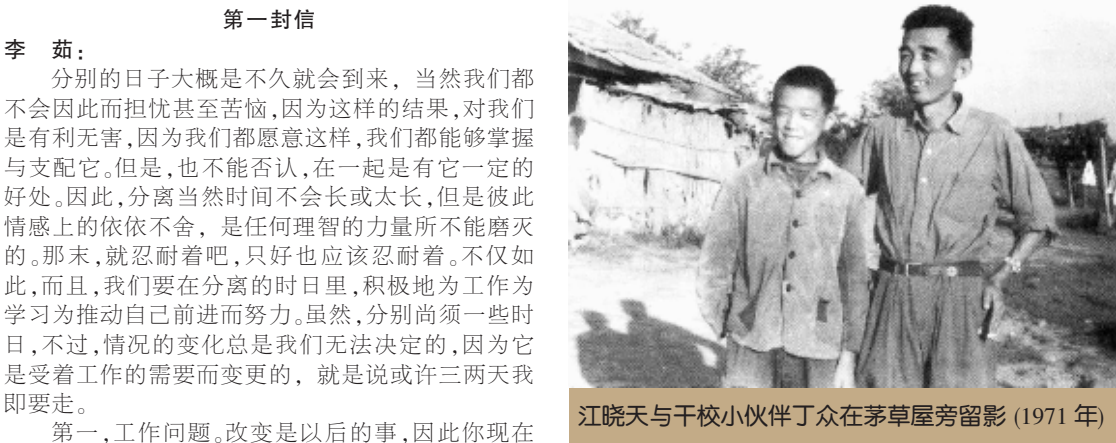
爱因斯坦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从这一意义上说，克辉先生的感人之处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现在一些学术会、业务会，住住是会而优待仕。会议组织者总要挖空心思打通各种关系，找到一些领导人出场以提高规格。这本不可厚非，中国特色呗！这些领导人到会坐一会儿，一般是会过小半，譬如简短的开幕式结束，便顺理成章地告退。这也可以理解，因为领导人年龄大了，身体欠佳，理应以照顾。问题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芝麻绿豆官”，也学会了肃规曹随，冠冕堂皇地中途开溜。所以不久见到的一个例外，令我难忘。

那是2009年9月18日，全国台联和中国作协召开“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曾任



江晓天、李茹夫妇（1983年）



第一封信

李 茹：

分别的日子大概是不久就会到来，当然我们都不会因此而担忧甚至苦恼，因为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是有利无害，因为我们都愿意这样，我们都能够掌握与支配它。但是，也不能否认，在一起是有它一定的好处。因此，分离当然时间不会长或太长，但是彼此情感上的依依不舍，是任何理智的力量所不能磨灭的。那末，就忍耐着吧，只好也应该忍耐着。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要在分离的时日里，积极地为工作为学习为推动自己前进而努力。虽然，分别尚须一些时日，不过，情况的变化总是我们无法决定的，因为它是受着工作的需要而变更的，就是说或许三天我就要走。

第一，工作问题。改变是以后的事，因此你现在应该安心地积极地做下去，绝不要把影响搞坏。一个人要有高度的进取心、顽强的性格，但是，能够忍耐，也是相当重要的。你现在就应该忍耐。注意，我所说的忍耐，不是说应该消极地被动地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让工作来压倒自己，而是，积极地把工作做好，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去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和经验（即是活的学问和知识）。就是说，我们对待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件事，哪怕是小得令人感觉不出，都应该该；不是马马虎虎地过去算完，而应该缜密地去体验它；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经过如何？结果怎样？你就会得出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天天能如此，集中起来即是异常宝贵的知识。

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去这样做呢？可以的，问题在于你采用什么方法。简言之，即是择其重点，即是从你一天（一个时段也可以）的生活（我所说的生活，是包括工作、学习、思想活动、待人接物等在内的，即是广义的说法）中，留给你印象或者感觉刺激最深的一件事或一个问题去作这样缜密的研究。特别注意的是，自己遇到困难，不懂的问题，做不好和做错了事情，一定不要胆怯、灰心，而且坚决勇敢地去想法子战胜它。任何再小的困难、不懂的问题，你能把它克服、学会，就是非常具体地把自己提高了一步。望你很好地记住这一点。要完全做到这样，虚心，不耻下问的精神是可贵的，绝不能犯一般女孩子的通病——虚伪的自尊心，我们应该把它称为前进路上的障碍，未来生命中的蛔虫。假如你要是犯得很严重的话，要很好地注意。

第二，学习。上面所说都是学习，生活即是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即是知识。当然，它只是粗糙的原料，尚须我们加工、提高。上面所说的“体验”即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学习，是指定形的、文字的学习。理论学习，有统一规定，希望你模范地遵行，不去多谈。下面提三点：一、文化学习，每半月能看一本（五万字上下）文艺小说，通过日记记，练习写文章（文艺报刊，文艺理论，写作指导，标点符号，文法，修辞学，都需慢慢地学），不要气馁，只要有决心，就可以获得成功。我的经验就是如此，15岁初中毕业，回到家乡（解放区），16岁即参加革命工作，教书，什么都不懂，就是因为我好学，而有恒心。从来没有别人帮助指



石 湾

的：我很敬这位同学，很爱这位同学——假如拿他的仪容比青山，那是最确切不过的了，修长的个子，圆润的眼珠，到处表示他个性的特征。

性和顺，长日是融浸在笑容里，长日是融浸在磊落的言笑里，他爱好研究新文学，善于口瑟，篮球又为他的特长。

我和君相识两年，知其生平可交深，当此毕业之际，为之小传，以留他日之鸿爪。（宏 生）

君性刚强，有毅力，天资聪颖，读书尤加勤勉，故成绩甚优。各科中尤长数理，课外阅科学书籍，君与余同窗数载，友谊良深，兹届临别之期，因为之作传，以资纪念云。（志 庆）

时隔60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位名叫宏生、志庆的同窗好友，对陆文夫的描述是很准确、很形象的。他后来之所以能历经磨难成为卓有成就的大作家，其兴趣爱好和个性特征，真的是早在读扬陋学塾时就留下了雪泥鸿爪。也可以说，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在扬陋学塾求学的这两年，是一段至关重要的难忘时光。

1999年，泰州市文联主席陆锦余，为刊印市文联《扬子江》杂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特刊”，打电话恳请文夫先生赐稿。陆文夫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很长时间不写稿了，你们要出特刊，我考虑考虑，即使写，也只能写个小稿，凑凑数，用不用由你们决定。”他这篇给家乡村刊物惟一的一篇小稿，就是《忆朱砚馨同学》。此文与其说是怀念一位女同学，还不如



江晓天和周扬、夏衍在一起（1982年）



江晓天与干校小伙伴丁众在茅草屋旁留影（1971年）

教我，主要是自修，虽然走了些弯路，但是，我从不灰心，因而有了今天——不说有何成就，但尚堪告慰自己。当然，我丝毫不满足，仍在为我的未来作虚心、积极的学习。二、政策学习。如果没有适当的书，《大众日报》《人民日报》应该常看，那上面就有很多政策材料，共产党的主张。报纸应该常看，时事政治学习也不可忽视。国际、国内的大事，应该关心、了解，是相当必要的。马上去吃饭，这几天忙于总结、交待工作，脑子很痛。还有“待人接物”、党的历史、基本知识的学习，待下次再写给你。我写得很粗糙，仅供你参考。有困难、问题，望提出研究。走后，这种机会虽有，但有些困难。

第二封信

李 茹：

这几天脑子确实用得不少，考虑很多，故原拟藉此机会写点东西的打算，已是不达意愿。就是写这封信也确比以往写几千字的文章都吃力气。你看，今天就把前信已告你的要说的问

题，忘记了是什么，只好重来拟定。

第三，大概是第三吧？关于待人接物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是很复杂的，在这里无法说得很详细，只能提出几个要领供你参考。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对人应该诚恳、坦白、热情。但是，必须有区别的，就是说看对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问题上。灵活机敏地运用一定策略。否则，就会被有些人把你看成“呆瓜”，会吃别人的亏。这一点，我已和你讲过几次，你虽然年轻，生活经验少，但是你很聪明，我想我这样提醒你，你是能够注意和掌握的。其次是“克己谅人”，有些问题，应该克制自己，体谅别人，这样会自己对任何人的关系，都容易更好。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

不要与一般人背后议论张长李短。如果别人和你讲，第一，避之。避之不得则听之，不去轻易表示“同情谁、反对谁”的态度。当然，绝不是说，你已经存有这些缺点，而是提供你注意。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是：此乃为一般青年所易犯之通病，要知今天没有这个缺点，不等于明天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事物、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就会把我们过去所没有（实际上是没有遇到相应的环境）的弱点暴露出来。所以说，一个人当着自己没犯错误时，绝不能泰然无事，应有所警惕，防患于未然。犯了错误时也不应慌张惧怕，应该沉着、冷静去对待，缜密而积极地考虑如何正视它，鼓足勇气，拿出决心去克服它。

第四，入党。我觉得你说得很好，可以而且应该向组织上提出这个要求。不过，不能要求过急，应该积极地靠近党，不断征求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意见，改进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把自己提高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水平。同时，从现在起，就要很好地学习党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的历史。党的一般基础知识，以文件精神检查自己、衡量自己。目前应该从这一方面着手——创造条件。

第五，怎样认识自己。这对青年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曾说过，“青年人最苦恼的事，就是自己不能认识自己”。这个问题要说清楚亦颇难，因为涉及的面很广。只说应注意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千万不要自满，“自满即是不满，即是慢性的自杀”，这是毛主席的话，应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自满即会腐蚀一个人前进的生命活力。虚心，是推动与刺激我们前进力量的重大源泉。第二，切忌气馁。遇到困难，碰了钉子，想躲避，那就糟糕，那就是永远苦恼的开始，它的结果是：后退与落伍；反之，大胆揭露，认真检讨，勇敢地克服它，就会永远地前进，愉快。再有，就是对自己的进步之看法，不要要求过高。过高，即脱离实际，会犯错误——急性病，盲目悲观。也不要看不到自己的进步，否则会失去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就是要用辩证的眼光全面地去看，要有历史观点的应用，即是从比较中去看，昨天、上个月，我在某一方面、一个问题上怎样，今天、这个月，我又怎样，进步了哪些，不够的又是哪些，明天、下一个月，怎么办？你这样，我想就很不错了。

最后，还想就前次所说的学习问题，补充一些：团的文件，应作为任务材料，很好地学习。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一定要看两遍。学习中应注意：第一，要有计划，不要盲目，要求得理解，不能粗糙（看小说不必这样），就是说，要把文件的基本精神吸收到脑子里，融化到自己的记忆里去，才能在实际中应用起来。第二，联系自己，即看了文件之后，应该想想，过去怎样认识的，对不对，哪些对，哪些不对，为什么？第三，要怀疑，为什么应该这样？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能囫圇吞枣，不加消化。

说的算是不少了，但是总觉得说不清楚，因为问题说得太多。过去的几个月，你说我对你有不少帮助，但是，我始终觉得相当不够，不是客气，因为我们用不着客气。由于环境关系——即工作的需要，当面说，机会极少，十天半月见一次面，说说的就完了，时间太短。写吧，要写得很长，工作任务又不允许有这样的精力和时间。当然，在我思想上，从未忽略过对你的帮助。否则，便不会在革命的基础上，使得我们的友情发展到这样程度。最近，根据你几次和我说的情况，提出的问题，我是都逐一地把个人的认识和意见说了，写了。望你自己再作进一步考虑。说到这里，我又想给你提个意见：你不要把我当成学生对老师一样，当然，我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我并不希望无条件地接受。今后，希望你，你也应该多给我提出意见，批评与帮助。过去几个月，你对我是有帮助的，提过一些批评的意见，有不少都很正确，我考虑了之后，已经接受、改了一些。今后，你也应该在这方面作努力。过几天我即要动身，互不相帮。至于你的哪里去的问题和时间，待后再决定。当然，主要的还要看组织上的意见如何。

总之，请你放心，我也放心。因为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相当时间的了解、考验，而……那么，谁都不应有……的理由。



陆文夫(左)为高晓声当翻译



《扬陋学塾一九四五级毕业纪念册》

说是感激扬陋学塾对他的培养。一开头他就写道：“上了年纪的人有一个特点，对青少年时代的人和事记得十分真切。”“当我在炮火中读完小学要升入初中时，已经是1942年，那时候的农村里没有中学，升学就必须到城里去，城里的公立学校都是敌伪所办，爱国者认为是奴化教育。当年的泰兴城里，有几位爱国的士绅和知名人士，还有一些抗战前就在上海、扬州教书的很有名望的老师，他们都不愿到日伪的学校里去做事，于是便在戴为数、杨元毅两位先生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扬陋学塾’，戴为数先生当塾长。我还清楚地记得，戴为数先生是个胖子，夏天穿一件白夏布的长衫，戴一顶铜箍，手拿一根手杖，在泰兴城里是个很有名望的人。扬陋学塾只办了一年就名声大振，一是教育质量高，二是有民族气节，不教日语。我慕名而往，从延令中学转学去读初中二年级。”

关于扬陋学塾的创建，纪念册在《级史》中亦有文字为证：本塾诞生于民国二十九年春，时变方殷，闾里不靖，青年学生彷徨歧途，莫知所从，邑中教育先进戴杨二先生，目击心伤，亟思补救，遂毅然创立本塾，俾吾侪得免失学，幸何如之。

晋级于三十一年春秋季始业，聘暑方消，录取男女齐集戴宅大厅，静听诸师之训诲，凡忘其荆棘遍地，烽火弥天矣。冯晓曾对我说：“也不知道这学塾为什么取名叫‘扬陋’？”在读了陆文夫的《忆朱砚馨同学》一文后，我就明白了，这分明是指

事。我会吹口琴，常常担任伴奏，奏的都是些当年的流行歌曲，什么《秋水伊人》《花好月圆》等等”；“初中毕业后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同学们各自分飞，纷纷到大城市里去考高中。那时候泰兴的学子都是奔南京、镇江、扬州、苏州等地去考高中。朱砚馨考入了扬州中学，我考入苏州中学”。据他在《道山亭畔忆旧事》一文中的回忆，“苏州的学校很多，苏

中是首屈一指，全国有名的，报考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地板上

都睡得满满的，平均要四五十人中才能录取一个。”他自觉考得并不好，考罢“心就凉了半截”，没想到发榜时“大名赫然在焉”！他“想来想去可能是一篇作文帮了忙”，“不知道被那位阅卷的老师看中了，给的分

数是大概是很可观的。”（《陆文夫文集》第四卷第141—142页）……我是1956年考入苏高中的，比陆文夫晚了11年。那年正好是他的成名作《小巷深处》在《萌芽》上发表，引起轰动，回母校来与文学爱好者们谈创作体会，也就成了我此生见到的第一位作家，或可以说，是他在道山亭畔，把我引上了文学的不归路。

苏州是园林之城，苏高中就在著名园林沧浪亭的西侧，校园内挖两方池塘（名为碧霞池）而垒起的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葱茏，山顶古色古香的道山亭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道山亭畔忆旧事》是陆文夫在1979年为纪念母校创办75周年而写的。读了冯晓给我看的《扬陋学塾一九四五级毕业纪念册》，我不禁想起我与陆文夫共同的母校，想起道山亭畔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和我毕业21年后第一次有机会回母校，是借到苏州去向他组稿之便……冯晓问我：“听说你是陆文夫《井》的责编？”我说：“陆文夫复出后，就作品的产量而言，比王蒙、高晓声、张贤亮、邓友梅他们那一批人要少得多，所以组到他的中篇小说稿不容易。他答应把《井》给我当时所在的《中国作家》发表，就看在我是他的小校友份上。”我想，冯晓作为陆文夫研究会的秘书长，热忱将《扬陋学塾一九四五级毕业纪念册》供我一阅，兴许也是看在我和他父亲冯沛涛与陆文夫都是校友加乡亲的份上吧？这不能不说是我这次泰兴之行的意外收获，实令我感动。

本版责编：冯德华